

浙东文人群与明前期文坛走向——从“元正统论”视角观照^{*1}

邱江宁

（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明代文坛格局中，浙东文人群的主要意义在于承元。在忠实执行朱明王朝意志，快速修撰《元史》的进程中，浙东文人秉持“元正统论”，概括提出元季创作总体上“通经显文”的特点，这也可以看作是明初的创作取向。基于“元正统论”而提出的“通经显文”创作观，没有因为浙东文人群退下文坛主宰地位而消失，代浙东文人群而起的江西派和台阁体，继续承元统之绪，以理学主导文学创作。直到“土木堡之变”动摇了“元正统论”的根基，更兼嘉靖时期与北元关系的变化，明代文坛才以复古运动的掀起而真正开启明季文风的锻造进程。

【关键词】：元末明初；浙东文人群；元正统论；通经显文；复古以开新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7)05-0143-10

DOI: 10.19563/j.cnki.sdzs.2017.05.018

浙东文人群在元末明初文坛格局中的意义，已有不少论著进行过相当繁复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讨论在向下行环节，即对浙东文人群与明初以及之后明代文学创作关系的讨论，用力甚多；在向上连环节，即浙东文人群与元代文风尤其是与在元代影响广及天下的馆阁创作风气的关系，则关注稍少。基于这种“下行”“上连”关注中的剪刀差，现有的讨论对于元末明初浙东文人群的文坛意义，尚留有一丝缝隙——是承元之绪开启大明还是视元如敝履，另立明季新风？由于这一研究缝隙的存在，研究者在指出浙东文人群创作理论中较为明显的理学倾向时，基本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出生地——婺州浓郁的理学氛围上，却较少考虑朱明王朝初期确立的“元正统论”的影响，并联系“元正统论”来考量浙东文人群的创作取向及其影响力。事实上，浙东文人群除了具有与朱元璋战争时期建立的君臣信任关系之外，更由于他们在学养上与元代馆阁文人的密切关联，使得他们在执行国家从政治层面确立的“元正统论”没有丝毫违和感；而且“元正统论”影响下的明初文坛，无论是浙东文人群以及之后兴起的江西派和台阁体，都并未对元季诗文风气进行有规模的批评，诚如明人所指出的事实所云“国朝诗不甚盛，盖袭宋、元之弊，弘治、正德间，其风渐开”^[1]蔡羽《西原集序》。一定程度上，认真执行朱元璋订定的“元正统论”理念的浙东文人阻隔了明代文人对本朝文风的建设进程。明正统以后，随着精英阶层越来越清晰的反“元正统论”思想的深入，明代文坛开始讨论元季诗风流弊，反思和批评理学对文学的禁锢，大力以复古而创新，进而开启明代诗文风气形成之路。

一、浙东文人群与《元史》的修撰

明初的文坛，浙东文人群之外，影响大的还有吴中文人群，此外还有闽地文人群、岭南文人群以及江西文人群等，而浙东

¹ 作者简介：邱江宁（1973—），女，江西南城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研究”（项目编号：15BZW052）的阶段性成果。

文人群的影响力最大。^②浙东文人群与朱明王朝的亲厚关系使他们在明初享受了大量政治资源，并因此主持撰修了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系列大型著作。以宋濂为代表，洪武二年（1369），总裁纂修《元史》；洪武七年（1374），总裁纂修《大明日历》《宝训》《孝慈录》《明太祖文集》等。^③这些体现着最高统治者意志的著述，抛开它们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不论，浙东文人群借助国家意识形态之力而加诸对明代前期文坛的深远影响力就非常值得讨论，而《元史》修撰不失为讨论的最好切入点。

综观元末明初的社会格局，初立的朱明王朝与尚存的元蒙王朝关系微妙，时间和形势使得初立明王朝的朱元璋只能依靠浙东文人群以尽快确立新朝的意识形态。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而据《元史·顺帝本纪》记载，1368年7月丙寅，“帝（顺帝）御清宁殿，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同议避兵北行”，“八月庚午，大明兵入京城，国亡”。^{[2] 986}这说明朱元璋宣布大明朝成立的时间比元顺帝逃出北京的时间早半年多，而且顺帝逃出北京，回到蒙古本部之后，驻扎于应昌府，以元为国号，仍以元王朝的正统势力存在。^④出于政权巩固的考虑，朱元璋比其他王朝更需通过修撰《元史》的方式来表明元统已亡，明纘而绍之，明王朝的建立具有合法合理性。所以，1368年冬，朱元璋即提出修《元史》之事，并于次年，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在南京天界寺诏令儒臣修撰《元史》，“皇帝即位之明年，四方次第平，乃诏文学之士萃于南京，命官开局，纂修《元史》”^{[3] 456}。在王朝草创之际，各方势力尚处于角逐状态的背景下，《元史》的修撰工作仓促开始。《元史》修撰之际，活跃于明初文坛的主要力量除浙东文人群之外，还有诸如吴中文人群以及江右文人群等，但只有浙东文人群在1369年初、《元史》撰修之前，已与朱元璋的吴王政权结成十年之久、相互之间信赖有加的君臣关系。相比较而言，能与浙东文人群影响力相抗衡的、活跃于吴中一带的，以顾瑛为中心的玉山草堂文人群和以“吴中四杰”“北郭十友”为中心的平江文人群，则迷恋诗酒聚会，关注自我情怀，对国家与政治缺乏热情。而且这些群体又与朱元璋的死对头张士诚集团有着或深或浅、千丝万缕的联系。^{[4] 79, 90}至于其他一些地域群体，则在创作成绩和影响力上都无法与浙东文人群相比。所以浙东文人群成为《元史》的撰修主力，是初立的朱明王朝必然的选择。可以看到，《元史》修撰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撰修人员共16名，其中胡翰（婺州）、陶凯（天台）、陈基（临海）、宋禧（余姚）为浙东人；第二阶段的参修人员15人，张孟兼（婺州）、朱右（临海）、朱世濂（婺州）为浙东文人，另外参与校对《元史》的苏伯衡亦为婺州文人，这样《元史》前后两个阶段，再加上两个阶段皆为总裁官的浙东婺州文人宋濂、王祎，共计33人，浙东文人群计11人，占三分之一，浙东文人群是名副其实的撰修主体。

为迎合朱明王朝急于通过修撰《元史》以昭示新朝已然确立的需要，浙东文人为主体的撰修群体则以史上最快速度修成《元史》。《元史》第一个阶段的撰修，开始于1369年2月，当年7月告一段落，用时188天；第二阶段，因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全书没有完成，于是派欧阳佑等人到全国各地调集顺帝一朝资料，于洪武三年（1370）二月六日重开史局，宋濂、王祎依旧为总裁官，用时143天修成。前后历时331天。比起前后历时九十多年，以严谨著称的《明史》，《元史》的完成确如钱大昕所称“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5] 183}，这也能看出浙东文人群率领的修史群体对于朱明王朝意志执行的得力和有效。

初立的明王朝虽然急于修《元史》，但针对北元势力代表元王朝而存在的现实情形，朱明王朝实际还试图借助《元史》的撰修，通过承认元乃正统，天意导致元明易代，明已成正统的态度来招徕人心，奉劝北元势力归降明朝。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二月，朱元璋在应天确立次年（1367）为吴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令出征将士传檄文谕告齐、鲁、洛、河、燕、蓟、秦、

² ①按：据胡应麟的描述，明初至少有五个比较有影响的地域文人群体，“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但浙东文人群的影响力最为突出：“国初闻人，率由越产，如宋景濂、王子充、刘伯温、方希古、苏平仲、张孟兼、唐处敬辈，诸方无抗衡者。”参见胡应麟：《诗薮》，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27、326页。

³ ②徐永明《宋濂年谱》，参见宋濂：《宋濂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57-3096页。

⁴ ③按：北元（1368—1634），1368年元惠宗迁都滦京，仍以“大元”为国号，因地处塞北，故称“北元”。共二十八位大汗，享国二百六十七年，1388年，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儿弑杀脱古思帖木儿篡位，“大元”国号不再使用。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位，建国鞑靼，北元分裂成鞑靼和瓦剌。北元不仅疆域范围比明朝大，而且享国时间几乎与明朝相始终。参见陈得芝：《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明史·鞑靼传》等等。

晋等地之人说，元朝虽起于草野，勘定朔方，但却是天意所择，“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但朱元璋也指出：“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6] 檄文的表达逻辑是，由于天意所授，元君虽为北狄，却能顺利入主中华，令四海归服；但是，自古胡虏无百年之运，现在元朝在中华大地上统治过百年，天意不再护佑，所以需要有新朝来立纲陈纪，拯救天下，明朝遂代元而兴。当然朱元璋的“元正统论”也包含着警示本朝臣民，不得挑战明朝顺天意成为正统的意味。对于朱明王朝“元正统论”形成的这层复杂心理，《元史》虽成书极速，却颇有体现。例如《元史·食货志一》篇首语中的这一段：

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宽。其用之也，于宗戚则有岁赐，于凶荒则有赈恤，大率以亲亲爱民为重……自时厥后，国用浸广。除税粮、科差二者之外，凡课之入，日增月益。至于天历之际，视至元、大德之数，盖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尝有一日之蓄，则以其不能量入为出故也。虽然，前代告缗、借商、经总等制，元皆无之，亦可谓宽矣。其能兼有四海，传及百年者，有以也夫。^{[2] 2351-2352}

《元史·食货志》中的这段篇首语与朱元璋明初对元朝的一些赞慕表态相当贴合。朱元璋曾表述云：“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7]，“朕本布衣，生长君朝承平之时，混于民间，犹勺水之下沧海，一粟之在大仓”^{[8] 1418}。而据《明史·太祖本纪一》记载：“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歿，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逾月，游食合肥。”^{[9] 1} 朱元璋生在元朝中下层，明明在元季过着生无养、死无葬、居无所的生活，却如此虚伪地赞美元朝，只能说朱元璋试图以崇元之论来淡化明代元兴的事实。尊为帝王的朱元璋出于政权巩固和招徕北元的需要，尚且如此虚伪地尊崇故元，那么，必须体现新朝意志的《元史》显然不能有违于此。虽然，同样是为迎合初明王朝建立的需要，《元史》为快速成书，多以《经世大典》、十三朝实录以及元人成稿为基础抄撰而成，而且在体例上，各篇之后“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2] 4676}，但在各志、各类传的篇首处，《元史》还是竭尽可能、谨慎婉转地体现出“元正统论”的观念。

尤其是发凡举例，笔记纲领处，则基本由宋濂通稿主笔，同列其他人唯有敛手承命而已：“时编摩之士，皆山林布衣，发凡举例，一俾于先生。先生通练故事，笔其纲领及纪传之大者，同列敛手承命而已。逾年书成，先生之功居多。”^{[3] 2594} 作为修撰主体的浙东文人群，尤其是总裁官宋濂对于那些体现着“元正统论”的言论负有极大的责任。宋濂与朱元璋相知甚深，对于初立的朱明王朝提出“元正统论”的复杂心理应该非常了然。^⑤某种程度而言，“元正统论”虽在《元史》中被以宋濂为核心的浙东文人群婉转而切意地表达出来，但实际是朱元璋的意志表达。^⑥所以，由“元正统论”观照明初及之后的国家意识形态，既是切实理解浙东文人群卓立于明初其他地域文人群的根本原因，也是深入理解明初文学创作取向的关键。

二、浙东文人群与“通经显文”创作理念的概括提出

由于朱元璋倡导“元正统论”，与其关系最近，也最能解读清楚国家意识形态需要的浙东文人群，在创作取向上主要表现为承前元之旧而非启大明之新。他们从《元史》修撰、科举考试内容以及文论批评几方面概括提出“通经显文”的创作理念。这一创作理念不仅是对初明最高统治者“元正统论”的呼应，更是对元代以馆阁创作群体为核心而形成的总体创作取向的概括总结。

细读《元史》，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仓促修成的《元史》在撰修体例上多承袭前朝，唯独“儒林传”的设置和前朝的意思大相径庭。《元史》不像前朝史传那样单列文苑传与儒林传，而是将儒林与艺文合为一体称“儒学传”。在“儒学传”篇首语

⁵ ①按：朱元璋渡江后不久，宋濂即投奔于他，朱元璋的许多文告，都出于他的手笔。参见陈高华：《〈元史〉纂修考》，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⁶ ②按：赵汭在《送操公琬先生归番阳序》中曾针对朱元璋接见《元史》撰修人员的谈话而感慨云：“尚赖天子明圣，有旨即旧志为书，凡笔削悉取睿断。”参见李修生：《全元文》，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54册，第438页。

中，宋濂对这一体例设置做出解释，并用“通经显文”四个字来概括元代文章的成就与特色。文章写道：

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颀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为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今皆不复为之分别，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辅教传后者，合而录之，为《儒学传》。^{[2] 4313}

这段话既高度概括、准确地提炼了元朝文章的创作特色，又基于“元正统论”为明初的创作定下方向。某种程度而言，这段话也可以看作是朱元璋文章态度的表达。作为最高统治者，朱元璋从攻取婺州之际就开始彰显出他以儒学治国，取经义而轻词章的态度。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攻取婺州之后，与婺州文人范祖幹讨论治国道理时认为：“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治太平，悉此道也。”^[10]此论是朱元璋“以儒治国”的哲学基础。洪武二年（1369）四月，朱元璋命国子博士孔克仁教授诸皇子及功臣子弟时，特别表明师长教学之道“当以正心为本”，而正心的基础在于“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11]。朱元璋在此所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即经义为本，词章次之。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再次清晰地表达他经义为本，词章当明白简易，且为经义服务的创作取向：“古人文章明道德、通世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术，达时务者，无事浮藻。”^[12]

根据朱元璋与大臣的谈话和圣谕来理解《元史·儒林传》的篇首语，则它的意思表达得相当简明扼要。首先这段话的写作风格符合朱元璋关于文章须“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的要求，也确如《元史》体例所云“文辞勿致于艰深”。^{[2] 4674}其次，这段话呼应朱元璋经义须服务文章的评价取向，直斥历代史传将经艺与文章分而为二的做法不合适，认为经义不借文章无法阐明和表达其主旨意趣；而文章不依据经义六艺则不足为文。最后，这段话还恰切地遵循了“元正统论”论调，指出元兴百年，“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元史》撰修者的意思很明白，元所以堪称正统，是因为它一直在正道。

而综观元代文章整体取向，尽管元季士林没有人提出过“通经显文”这一说法，但在如何改正前朝创作弊端的问题上，南、北士林达成共识，认为只有消弭经学与文艺的壁垒，二者融合，才能真正摆脱金源、南宋以来文艺创作逼仄怨忿、萎靡卑下的创作格局。元代创作风气的形成历程，实质上就是以馆阁文人为核心的元季士林，为去除前金故宋影响，通过经、文合流的方式，最终找到开新大元创作风气的文艺复古历程。起初，理学家姚燧为核心的北方优秀文人，不满于金源追求辞章，轻视理学，不务实用的文风习气，认为“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2] 4059}，慨然主张从经文合流的角度扭转文风。姚燧的创作主张得到了元明善、张养浩、李术鲁翀等北方馆阁文人的追随与支持，从而基本奠定元朝文风转变的方向。元朝统一江南以后，南方士林大举北上，在程钜夫的带领下，馆阁中的南方士林对南宋末年文艺创作亦纷纷予以批评、反思，认为南宋文艺创作的深刻弊端在于经、文判为二端：“说理者鄙薄文词之丧志，而经学、文艺判为专门。”^{[13] 500}尤其是元代大德、延祐之后，以奎章阁文人群体为核心代表的馆阁文人群，对元代上至馆阁下及山林，以通经显文为主的文章风气的形成影响深远。奎章阁文人群基本是正宗正派、相当虔诚的程朱理学子弟，他们所强调的“真率调畅，简散深至”^{[13] 504}风格，要求创作者既不以世变忧乐婴于心，更不能恣肆放纵，偏离情感的本原，这种要求的精神实质是儒家的中和思想。由于馆阁文人的大力推举，元代文坛自馆阁至山林，无论名宦之臣又或者布衣之士，基本形成与元朝多种文化并存现实相呼应的，以经为本，涵容百史百家，务实平和的“通经显文”风格。

与明初其他地域文人群相比，浙东文人群与元代奎章阁文人群的关系尤为密切。在元代奎章阁文人群的核心成员中，黄潛、柳贯、胡助、吴师道等人都是婺州人，他们都是宋濂、王祿、胡翰等人的老师。另外，作为延祐首科进士，欧阳玄、黄潛是元代奎章阁文人群中中年寿最长者，他们诚可谓元代“通经显文”创作风格形成的直接参与者，也是一直努力推阐“通经显文”创作风格的文坛核心人物。宋濂与黄潛关系至为密切，自认为是黄潛“老门人”^{[14] 782}、侍从黄潛游学最久^{[14] 784}；而黄潛也深深认可宋濂，认为斯文至于宋濂方可谓“不乏人矣”^{[3] 2801}，并经常令请宋濂代笔以应四方求文者，可见宋濂得黄潛浸润之深。宋濂对欧阳玄也至为推重，声言“自总角时即知诵公之文，屡欲裹粮相从而不可得”^{[3] 686}，而欧阳玄也认为宋濂文章深得馆阁气

质，能黼黻一代。^{[3] 2722} 此外，刘基是元朝元统元年进士（1333），当年的主考官是奎章阁重要文人宋本。而王祿、刘基等浙东文人对奎章阁核心文人苏天爵的为人及其著作《国朝名臣事略》等非常倾慕并努力效仿，所以，浙东文人群在学养上贴合了明代“元正统论”影响下的通经显文创作主旨，并给予了它非常贴切的诠释。

另外，落实到元季士林、朱元璋以及浙东文人群所称说的“经”，确切地说，是指从元朝起被尊奉为官学的程朱理学。这依旧是一个需要再结合朱元璋订定的“元正统论”，由宋、元、明三朝的科举内容入手，而稍加讨论的问题。《明史·选举志二》叙录明代科举认为：“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9] 1693} 朱元璋与刘基共同制定科举议程，这没有问题，但科举程式以哪朝旧制为依据则并不像《明史》所云，“沿唐、宋之旧”。实际上，明代的科考在“元正统论”论调的主导下，基本承元制而定，那就是以程朱理学为考试基本内容。需要辨明的是，程朱理学产生于南宋，宋理宗曾公开称赞程朱理学为孔孟道统正脉，并在淳祐元年（1241）正月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进文庙，从祀孔子；又亲书朱熹《白鹿洞学规》颁赐太学。宋理宗对程朱理学的态度对于程朱理学取得正式官学地位具有标志性意义，但是，在宋朝，程朱理学没有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宋史》关于宋代科举内容如下：

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凡《三传》，一百一十条，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15] 3604-3605}

由上述一段引文可以知道，虽然宋代科举很发达，但并没有将程朱理学作为考试依据。直到元代，皇庆二年（1313），由李孟、程钜夫、许师敬等人组成的科考讨论中，确定元朝科考考试内容“经学当祖程颐、朱熹传注”^{[2] 4017}，程朱理学作为科举主要内容取得了“学者澜倒”式的文化影响力。明修《元史》有关科举程式的内容如下：

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2] 2019}

正如元季时人所云“其程试之法，表章六经。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16] 74}。也正是由于元代科考的这一规定，从此元朝“群经、四书之说，自朱子折衷论定，学者传之。我国家尊信其学，而讲诵授受，必以是为则，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于是乎“书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13] 658}，从而最终推动元朝形成以程朱理学为宗，学者遵信，不得疑二的官方意识形态格局。再看明朝关于科举内容的规定：

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澧《集说》。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9] 1694}

明朝承元朝之旧，也以程朱理学作为考试主要内容，只有《春秋》在胡传的基础上加上张洽传，但永乐后，也不再用张洽传。而明朝的《礼记》自永乐后，不再袭用元朝用的古注疏，而是只用元朝大儒陈澧的《礼记集说》。无论怎样，明朝承元之习却是无可争议的。另外，洪武三年（1370）五月一日，朱元璋谕告天下的科举诏云：

汉、唐及宋科举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词章之学，而未求六艺之全。至于前元，依古设科，待士甚优。……洪武三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取怀材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17] 卷八一，1539}

朱元璋的诏书很明确地指出，汉、唐、宋的科举制度只看重词章之学，未求六艺之全，只有元朝科考设置则能依循古制，且对读书人颇为优待，这种口风再次坐实了朱元璋时期对于“元正统论”的倡导。

这样，在元朝，“程朱理学”被定为官学之后，通过科举的方式，使得元代士林从馆阁到山林都努力由“通经”而“显文”；在明朝，由于朱元璋的原因，尤其是“元正统论”的背景，再次借助科举考试顺利地操控了明朝读书人的思维方式与创作取向。浙东文人群作为朱元璋亲信的文人群，又源于他们自身与元代中期馆阁文人的密切关系，所以他们最终能基于“元正统论”，既贴切地概括出元朝自馆阁至山林“通经显文”的总体创作倾向，又给明朝前期创作取向定下基调。

三、浙东文人群“通经显文”观的理论表达

《元史》“通经显文”观虽然是宋濂提出的，但实际代表的是朱元璋“元正统论”影响下，整个《元史》撰修群体以及刘基等一批在朝浙东文人群基本认同的创作观，这一创作观表现为以经学为主、重馆阁雅正之气、务实轻文等一系列创作取向。由于浙东文人群的这些创作取向实际是朱元璋“元正统论”的折射，所以，尽管朱元璋高压政策下，浙东文人群的代表人物诸如宋濂、王祿、刘基、朱右等逐一以肉体的消亡而退出明代文坛，尤其是燕王篡位，“方孝孺事件”发生，更意味着浙东文人群在明代文坛的彻底退场。但在“元正统论”没有退场的背景下，浙东文人群之后，主持明代正统文坛的江西文人群以及台阁体，他们依旧以程朱理学经旨为创作依归。而以“土木堡事件”为转折点，更兼弘治以后，国家文治态度的总体宽松情境，精英文人群开始对“元正统论”进行反思，具有反理学倾向的“茶陵派”出现；嘉靖中叶，随着嘉靖皇帝对北元政权反感情绪的加深，士林对“元正统论”的批判倾向逐渐加强，明代文坛才逐步以反程朱理学的复古运动掀开明季文风的锻造历程。

藉由浙东文人群在明初给同僚文集所作序言来综观他们的创作理论，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主张以理为主，以气摅之，文风朴实有物，与时进退。典型如朱右对宋濂文章的评价。朱右是台州临海人，《元史》参修者，明初著名文章理论家。在文章观念上，朱右推崇文道合一，以“辞严而理闡，气壮而文腴”为文章标准，曾编选“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为《八先生文集》”，所谓唐宋“‘八家’之目，实权輿于此”^{[18] 2267}。朱右也非常推崇元代文章风格，又编辑元朝诸名家散文为《元朝文颖》。由于撰修《元史》，了解了宋濂的学问与才识，朱右对宋濂成为入明之后的文坛领袖地位极为认同。朱右相信文章与时代气运相关，“文章气运，与道污隆”，宋濂“当文运肇开”之际，又“褒然司文衡之枋”，正有以开启明代文章兴盛之业。^{[3] 2741}

再如刘基对苏伯衡文章的评述。刘基认为文章以理为核心，气运导之“文以理为主，而气以摅之。理不明，为虚文；气不足，则理无所驾”，刘基的这一文章观点，几乎就是宋濂在《元史》中“通经显文”观的再现。在刘基看来，元朝虽“仅逾百载”，但缘于土宇最广，“气昌而国昌”，遂“有刘、许、姚、吴、虞、黄、范、揭之俦，有诗有文，皆可垂后者”。刘基认为，元朝文章之盛在于土宇宙辽阔，现在明朝尽有元之幅员，应该也会有元朝一样的文章繁荣气象。苏伯衡生当明朝，他的文章“辞达而义粹，识不凡而意不诡，盖明于理而昌于气者”，“他日必以文名于盛代，耀于前而光于后也”。^{[19] 117, 118, 119}

尤其是宋濂关于馆阁山林风格之辨的言论《汪右丞诗集序》。它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宋濂入仕馆阁之后的“忘本”之论，而应视作宋濂对朱元璋倡导“元正统论”和台阁风格的呼应。宋濂的这篇序言写在洪武三年（1370）四月，与《元史》撰修时间同时。文中，宋濂还特意指出：“虽然，《诗》之体有三：曰《风》，曰《雅》，曰《颂》而已。《风》则里巷歌谣之辞，多出于氓隶女妇之手，仿佛有类乎山林。《雅》《颂》之制，则施之于朝会，施之于燕飨，非公卿大夫或不足以为，其亦近于台

阁矣？……皇上方垂意礼乐之事，岂不有撰为《雅》《颂》，以为一代之盛典乎？濂盖有望于公。”^{[3] 460} 宋濂本人作为黄溍、柳贯等元代馆阁核心人物的学生，又与陈旅、欧阳玄、危素等馆阁文人互相欣赏，对于元代自馆阁而披靡山林的馆阁创作风格熟悉而且认同，这篇序言的态度与元代馆阁文人的馆阁创作倾向有同声合气之似：

昔人之论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山林之文，其气枯以槁；台阁之文，其气丽以雄。岂惟天之降才尔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发于言辞之或异耳。濂尝以此而求诸家之诗，其见于山林者，无非风云月露之形，花木虫鱼之玩，山川原隰之胜而已。然其情也曲以畅，故其音也渺以幽。若夫处台阁则不然，览乎城观宫阙之壮，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厉其志气者，无不厚也，无不硕也。故不发则已，发则其音淳庞而雍容，铿鍠而鏗鞳。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3] 459}

作为由山林之士升格为馆阁重臣的文人，宋濂切实体验到了馆臣见识广远对于创作视角与胸襟的影响。再加上朱元璋“元正统论”以及对台阁雅正风格的倡导，在这段序文中，宋濂由衷地指出，馆阁地位的根本优越性在于它能改变人的创作气象，会使创作者“不发则已，发则其音淳庞而雍容，铿鍠而鏗鞳”，宋濂以为正是这种馆阁气象才能令天下学者风动从之。宋濂的这一观点和元末馆臣张翥的观点几乎一致。张翥在给同僚、著名馆臣许有壬的《圭塘小稿》作序，曾特意讨论文章的馆阁之气，指出所谓“馆阁之气”虽未必一定“挹藻于青琐石渠之上，挥翰于高文大册之间”，但它的创作风格必然是“尔雅深厚，金浑玉润，俨若声色之不动，而薰然以和，油然以长”，它与“滞涩怪僻、枯寒褊迫，至于刻画而细、放逸而豪”的风格大相径庭。张翥认为元代自至元、大德以后，人们就在馆阁文人的引领下，风声气习，努力追求并形成“牢笼万象，漱涤芳润，总揽山川之胜”、“尔雅深厚”的馆阁风格。^{[20] 第48册, 586} 张翥生于1287年，卒于1368年，他的这篇讨论“馆阁之气”的《圭塘小稿序》作于1360年，比宋濂这篇辨析台阁、山林之文的《汪右丞诗集序》早了十年，而以宋濂与张翥的关系，他应该是了解并知道张翥的观点的。基于朱元璋“元正统论”的态度以及朱元璋对台阁风格的肯定，所以宋濂在自己请老致仕时，向朱元璋举荐苏伯衡替代自己，认为苏伯衡自中年肆力于古文辞之后，“精博而不粗涩，敷腴而不苛缛，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3] 648}。这正是台阁雅正风格的典型体现，无怪乎刘基也对苏伯衡非常的肯定。

尽管浙东文人群努力贴合朱元璋的统治理路，但在朱元璋高度专制和集权的管控下，依旧难逃政治厄运。洪武八年（1375），刘基被毒死，其长子刘璉亦遇害；洪武十年（1377），张孟兼以刚直被逮至京城捶死；洪武十四年（1381），宋濂举家流放四川，本人中途自杀死于夔州，子宋璉、宋慎均被处死；洪武十九年（1386），吴沉以宫人谗言下狱死；洪武二十一年（1388），苏伯衡以表笺忤旨下狱而死，子苏恬、苏怡欲代父受刑，同被处死；等等。尤令人痛惜的是，建文四年（1402），浙东文人群的优秀代表、宋濂最得意的弟子方孝孺因为忤逆日后成为明成祖的燕王而“被磔于市”，弟孝友，同时就戮，宗族亲友弟子多被牵连。浙东文人群主宰明代文坛的时代遂告结束。^{[21] 85}

浙东文人群之后接替主盟地位的文人群是江西文人群以及他们所倡导的台阁体。除了与浙东地域一样，江西也理学风气甚浓之外^{[21] 100-111}，更重要的是，江西文人群和浙东文人群一样承元统之绪，秉持“通经显文”文学观，倡导平实典雅的创作风格。典型如被视作台阁体代表作家的刘崧。刘崧1321年生于江西泰和，早年曾与李叔正、周浚、辛敬、万石、杨士弘、刘原善、查和卿、郑大同、刘永之、练高等活跃于豫章文坛，被称作“十才子”。“十才子”中，尤其是郑大同、杨士弘和练高等，都深得元代中期馆阁文人虞集、范梈、揭傒斯等人雅正之气习，“温厚而丰丽”，“足以绍其声光，而踵其轨辙者”。^{[20] 第55册, 286} 就诗歌成就而言，宋濂认为刘崧的创作由明经而显文，稽古而求新，扬擢风雅，五美云备^{[3] 496}；四库馆臣认为刘崧作为江西派的代表人物，以清和婉约之音开启杨士奇为首的台阁博大之体，具有平正典雅实的风格。

站在明初“元正统观”的视角，再对照洪武、永乐时代的元正统观，可以看出江西文人群在永乐时期的崛起与浙东文人群在洪武时代的显赫没有根本区别。在朱元璋时代，对“元正统观”的倡导使得朱元璋非常不愿意群臣对元朝有睥睨歧视之态。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看到中书省拟的榜谕称元朝官为伪官，元兵为贼众，就深责宰相道“元朝虽是戎狄，然主中国为正统之君将及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岂宜以此称之”^{[22] 第8册}。洪武六年（1373），京师建历代帝王殿，元世祖与汉高祖、唐高祖等赫然同列。^{[23] 490} 朱元璋对元朝如此尊奉，故而有浙东文人群作为《元史》撰修主

体，在元正统观的指引下，代表最高官方意志，以元代形成的“通经显文”创作风格作为明初文章的基调。

燕王篡位成为明成祖，对朱元璋力主的元正统之说极力秉持，也站在天命的角度提出“华夷本一家”观。明成祖认为：“华夷本一家，朕奉天眷，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尔？”^[24]对于大臣的不配合，朱棣也如乃父一样，予以警戒。永乐十年（1412），洮州卫所镇抚大臣陈恭在上疏中指出“外夷异类之人，不宜置左右。玄宗几丧唐室，徽、钦几绝宋祚，夷狄之患，可为明鉴”。朱棣将陈恭的奏疏宣示群臣，并予以驳斥道：“天之生才何地无之，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何必分别彼此？……若玄宗宠任安禄山，致播迁之祸，政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宠任小人，荒纵无度，以致夷狄之祸，岂因用夷狄之人致败。春秋之法，夷而入于中国则中国之，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近世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10]藉由朱棣这番令群臣颇为难的话语可以看出，“元正统论”在明成祖的时代依旧非常强势。在永乐年间依旧强势的“元正统论”的主导下，江西文人群和台阁体又一次站到明代文坛的中心。^⑦

导致江西派和台阁体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土木堡之变”。作为明朝政治、军事和外交史上的奇耻大辱，土木堡之变也是动摇江西文人群和台阁体在明代文坛根基的标志性事件。这场造成明英宗北狩、数十名文武精英殉难、死者数十万的事件实际是对明初君王“元正统论”的最辛辣的讽刺。“土木堡之变”后，以重撰宋、元史为契机，出现了大量元史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明显增添了炽热的夷夏之防的气氛，精英文人群隐忍许久的“民族主义”情怀日渐滋长。^⑧在这种社会背景中，追随元代馆阁平实典雅风范的台阁体以及台阁体作家自身的人品亦逐渐为士林所针砭和厌烦。^⑨随着精英阶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元正统”民族情绪的日渐高涨，明代文学在精英文人们革除前元影响的复古更化进程亦由之开启。应该说，明代复古运动的掀起才使得浙东文人群和台阁体在明代文坛的影响彻底消失。而在如何消除浙东文人群和台阁体的文坛影响力方面，精英文人们从弘治年间一直到嘉靖末年才努力完成，这个过程中，“元正统论”的逐渐退场依旧值得关注。

可以看到，弘治年间，鞑靼屡扰，西北边境多有战事。开创阳明心学的王阳明是弘治二年的进士，他自小即有“夷狄之防”意识，曾独自游访居庸三关，借对东汉大破匈奴的马援的敬慕而表达自己憎恶鞑靼、渴求经略四方的志向。致使阳明心学产生的原因很多，但是，“心学”反对“程朱理学”的“先行后知”论，提出“知行合一”论，不能不说内在滋生的民族情绪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基础对于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明代士人从怀疑元朝树立的官学——程朱理学出发，提出心学，具有一定的暗启意义。而明代复古运动“作为一种代表新的历史要求反对程朱理学的进步思潮”，它与阳明心学和当时整个思想界的关系颇深。

[21] 166 先是兴起于明成化、正德年间的茶陵派。作为复古运动先声，茶陵派创作上主张以性情为主，直以汉唐为师，力图把文学从程朱理学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进而荡涤台阁平正醇实的诗风。之后，“前七子”复古运动追慕汉唐风范，期望通过向民歌学习的方式来摒除程朱理学对于文学创作的桎梏。囿于其时“元正统论”依旧有影响力的背景，茶陵派的理论批评并没有否认元风，认为“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耳。极元之选，惟刘静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轩轻”^[25] 3。到“前七子”复古派，他们期望“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26] 275，并提出向民歌学习以实现突破理学禁锢。值得注意的是，“前七子”复古派非常欣赏元代民歌：“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琐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崧崧先生初自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27] 647 李、何二氏对元代民歌的态度还是能让人依稀看到一点“元正统论”的影响。

到嘉靖年间，明朝与北元的局势更为紧张，嘉靖皇帝对北元势力至为厌憎，士林的反“元正统论”更为高涨，这是明代“后七子”复古运动兴起非常值得重视的社会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嘉靖九年（1530），朝廷下令将孔子神位题为“至圣先师孔子”，去其在元朝加封的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黜姚广孝太庙配享资格，“以其尝从胡教也”；黜吴澄孔庙从祀资格，“以其尝

⁷ ①按：廖可斌先生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台阁派就是江西派，台阁体就是‘江西体’”，“永乐以后，文坛的领导权再次发生转移，又落到了江西派文人手中”，参见廖可斌：《明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06 页、第 101 页。

⁸ ②按：参考据小飞：《明代元史观研究——以明人撰述为中心》，河北大学 2015 年硕士论文。

⁹ ③按：“台阁体”代表作家杨士奇的文集在正统时期尚为士子追捧，“土木堡之变”后逐为士林所厌弃，其前后遭际，可视为文学思潮发生转变的一个标志，参考廖可斌：《明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8-129 页。

仕胡君也”。^[28]嘉靖十年（1531），翰林修撰姚涑上《论元世祖不当与古帝王同祀疏》，请黜元世祖入历代帝王祀，以正祀典。尽管嘉靖以“太祖神机睿断，将世祖入祀，迄今已有百余，宜尊旧制”，驳回了姚涑的奏疏，“庙祀如故”^[29]，但姚涑的疏论非常典型地反映出其时精英阶层长久以来对“元正统论”的反感。随着明朝廷在边境战争中未能取得令士人满意的“交代”，尤其是嘉靖二十九（1550）“庚戌之变”，俺答大军攻掠大同，由密云陷怀柔、顺义直至通州，再至于京城东直门外，令京师大震，士林反“元正统论”的态度更加激烈。礼官陈棐上《除胡邪正祀典以昭华夷大分疏》认为：“第一莫急之务，尤自于严内夏外夷之辨，明万世之纲常，以正百代之典礼”，强烈要求革除元世祖之祀历代帝王庙，认为只有借正祀典之名目才能令“内夏外夷”之大义明；只有“大义既明则士气自奋，士气既奋则兵威自扬，斯可以系不孩之颈，梟台吉之头，致之阙下，以奠中国万万年盘石之安”。^[28]陈棐的奏疏其实与二十年前姚涑的奏疏意思非常一致。边患不断的现实，更兼群臣的不断建言请求，最终世宗皇帝诏令“撤其（元世祖）塑像，革其祀”^[29]，此举也预示着由明太祖朱元璋代表明代官方开启的“元正统论”在嘉靖朝完成了更张。

围绕政治领域“元正统论”的更张，较诸“前七子”复古运动声势更为浩大的“后七子”复古运动在嘉靖二十七（1548）前后兴起。基于“元正统论”的更张，循沿“前七子”提出的“宋无诗”理论，“后七子”将“前七子”提出的“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26] 266}的评鉴理路加以强化，直斥“元无诗”，彻底否认了依循和追慕元代馆阁风雅的“台阁体”存在的依据。这种意识更直接地体现在“后七子”领袖李攀龙编选的《古今诗删》的体例中。《古今诗删》在隆庆元年（1567）前后已成稿，共计34卷，收诗2180余首，卷一至卷二十二选录“古逸”及汉至唐代各体诗歌，卷二十三至卷三十四选录明代各体诗歌，中间尽略宋元两代之作。而且为了“诗规盛唐”，该书宗尚唐音尤其是盛唐诗歌，盛唐诗歌选编比例跃升至第一位。另外，为了强化“后七子”的意义，该书编纂明显包含了集中标榜七子集团成员诗歌创作的用意。卷二十三至卷三十四所选明诗，七子集团不仅个体选录的数量大多居先，而且总体占据较高比例。^{[30] 375}毋庸置疑，李攀龙这种裁断的做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他“向外界提供了一部呈现鲜明立场的诗歌摹习范本，特别是取舍之际明晰的倾向性，以及为七子集团成员之作的张目之举，确立起诗歌领域学古基准以引导风气的意图不言自明”^{[30] 376-377}。而就彻底隔断与前元的瓜葛，重新锻造本朝创作风气而言，《古今诗删》实际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叙论至此，诚如廖可斌先生所指出的：“元末明初，文学思潮曾发生重大转折。有明一代的文学思潮，就是直承这一转折而来的。因此我们考察明代文学思潮的演进过程，又不得不从元末明初的文学思潮谈起。”^{[21] 59}与其他朝代急于区别于前朝，力主革新的态度相比，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就奠定了“元正统论”的基调，并且别别扭扭地维系到了嘉靖后期，这种政治层面的干预极大程度地阻隔了明代文人锻造本朝文风的进程，这期间元末明初活跃的浙东文人群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承元还是启明的态度上，浙东文人群以及之后的江西文人群在“元正统论”基调没有更张的背景下，其意义基本在于承元。直至“土木堡之变”完全动摇了“元正统论”的合理性，明代文化界、思想界纷纷以质疑程朱理学、厘正明礼的方式反“元正统论”，明代文坛才得以真正逐步开启本朝文风的锻造进程。

参考文献：

- [1] 黄宗羲. 明文海 [M] // 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2] 宋濂，等. 元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 [3] 宋濂. 宋濂全集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 [4] 左东岭. 平江文人群体与玉山草堂文人群体关系研究 [M] // 明代文学思潮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5] 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 [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
- [6] 朱元璋. 太祖传檄中原檄 [M] // 孔贞运. 皇明诏制. 明崇祯七年刻本.
- [7] 陈建. 皇明通纪法传全录 [M]. 明崇祯九年刻本.
- [8] 董伦, 等. 明太祖实录 [M]. 台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 [9] 张廷玉, 等. 明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0] 雷礼. 皇明大政纪 [M]. 明万历刻本.
- [11] 朱睦㮮. 圣典 [M]. 明万历刻本.
- [12] 王兆云. 皇明词林人物考 [M]. 明万历刻本.
- [13] 虞集. 虞集全集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 [14] 黄潛. 黄潛全集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8.
- [15] 脱脱, 等. 宋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6] 苏天爵. 伊洛渊源录序 [M] // 滋溪文稿.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7] 王世贞. 科举考一 [M] // 弇山堂别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18] 纪昀, 等.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整理本)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19] 刘基. 苏平仲文集序 [M]. 刘伯温集.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
- [20] 李修生. 全元文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
- [21] 廖可斌. 明代文学思潮史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 [22] 詹同, 等. 皇明宝训 [M] //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8.
- [23] 谈迁. 国榷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24] 娄性. 皇明政要 [M]. 明嘉靖五年戴金刻本.
- [25] 李东阳. 麓堂诗话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26]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 (中)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27] 沈德符. 时尚小令 [M] // 万历野获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8] 陈棐. 除胡邪正祀典以昭华夷大分疏 [M] // 贾三近. 皇明两朝疏抄. 明万历刻本.

[29] 徐学谟. 世庙识余录 [M]. 明徐光稷活字印本.

[30] 郑利华. 前后七子研究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